

现代传播文丛
(第三辑)
总主编 胡智锋

年度对话

中国传媒发展的
回顾与展望

胡智锋 编著

年度对话

中国传媒发展的
回顾与展望

胡智峰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度对话:中国传媒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胡智锋编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657-1264-7

I. ①年… II. ①胡…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6369 号

年度对话:中国传媒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编 著 胡智锋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李水仙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北京泰丰领秀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mm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264-7/G·1264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 胡智锋

2014 年是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建校 60 周年的年头,《现代传播》也迎来了创办 35 周年。为纪念这些重要节庆,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同仁商议,延续以往阶段性整理出版《现代传播》文丛的做法,接续上一套“文丛”,把 2009~2013 这五年来刊发在《现代传播》上的精品文章遴选出来,按刊物的栏目类别汇集成若干卷册,以新的形式展示给广大读者,也算是我们《现代传播》献给国庆、校庆和刊庆的一份礼物吧!

翻读各位编者初编的本套文丛各卷的篇章目录,当时每一期编刊的情形如在眼前!放眼看去选题丰富多样,写法千差万别,汇到一起该如何表述这套文丛的整体特点呢?想来想去,脑海里蹦出一个词——“回应”!是的,以一个“回应”或许可以粗略地概括这些文字的总体探求!以这个“回应”可以切出三句话:回应时代召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

首先,回应时代召唤。2009~2013 这五年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因此约请或选用了相关文章,在回顾与反思中对于某个领域或方面的发展进程予以重新梳理与揭示。如郑保卫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传统》(建党 90 周年),朱虹先生的年度对话《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新起点》,黄勇先生的《论新中国 60 年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吴学夫、黄升民先生的《大国图腾——承载 60 年国家理想的家国图像》(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黄式宪先生的《关于近 30 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周星先生的《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改革开放 30 年)都是这些重要时间节点上的整体性描述的代表性篇章。

在专业层面上,也有一些重要时间节点被我们关注,如“春晚”30年、中国电视民生新闻10周年、《今日说法》10周年、《论道》3周年、央视纪录频道元年、江苏卫视品牌定位升级元年等,在这些时间节点上,来自政府、业界、学界不少领导、专家、学者发表了有时效性、针对性、启示性的文字,他们是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刘习良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电视学界老前辈朱羽君、高鑫、王伟国先生,业界领军人物周莉、景志刚先生,学界重量级学者王一川、尹鸿、喻国明、俞虹、孟建、李幸、时统宇、丁亚平、丁俊杰、张同道先生等。

其次,回应现实需求。不论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传媒业界与学界,过去几年面临的形势与背景或许都离不开全球化,媒介融合与公共服务日渐深入的现实。如何理解这几个重要现实背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何应对媒介融合的不可阻挡的态势?如何在新的媒介与社会环境下,调整与完善公共服务的领域与空间?作者们给出了令人关注与期待的解答。

如关于全球化命题的研究,有如下大作:黄会林先生的《“第三极电影文化”构想》,叶皓先生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陈圣来先生的《文化强国与中美之梦》,贾磊磊先生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论非文字类文化符号的传播效应》,张国良先生的《沟通与和谐:汉语全球传播的渠道与策略研究》,荆学民先生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夏骏先生的《在文明较量的时间差中坚守——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宏观命题探讨》。

而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少探讨值得关注,如胡正荣先生等的《跨学科视野中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进程与问题》,陈卫星先生的《关于中国传播学的本体性反思》,胡翼青先生的《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刘海龙先生的《传播研究的两个维度》等。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有如下大作:朱虹先生的《中国数字电影的现状与发展战略》,黄勇先生的《论中国广电在“三网融合”新阶段的战略方位》,庞井君先生的《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思考》,李良荣先生等的《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新传播革命研究》系列,王武录先生的《报业全媒体发展研究》,熊澄宇先生的《对新媒体未来的思考》,黄升民先生等的《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电信”新业态》,彭吉象先生的《数字技术时代的影视美学》,王甫先生等的《我国3D电

视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探析》,石长顺先生的《中国报业的 iPad 生存》,刘德寰先生的《手机互联网的 digital 鸿沟》,张红军先生的《中国电视剧的网络化生存》等。

关于公共服务的研究,特别是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及相关社会治理方面则有如下大作:邵培仁先生等的《信息低保——构建信息公平社会的基本保障》,段京肃先生的《乡村媒介、媒介乡村和社会发展——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国乡村的几个概念》,袁军先生等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与政府形象修复策略研究》,廖祥忠先生等的《论“电子大字报”的传播特点、社会危害及应对之策》,胡泳先生的《在互联网上营造公共领域》,方兴东先生等的《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研究》,谭天先生的《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何志武先生的《网路民意与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许加彪先生的《风险社会下中国环境安全的信息公开:新型媒介生态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等。

不论是全球化、媒介融合抑或公共服务研究,上述文字都以强烈的社会关怀回应了我们传媒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发展需求。

再次,回应理论创新。近五年老中青几代学者都以饱满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考,贡献出不少理论创新成果。

关于新闻改革的研究,有童兵先生的《“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叶皓先生的《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喻国明先生等的《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高晓虹先生等的《美国电视竞争格局及其策略借鉴》,涂光晋先生等的《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台”——“人民网”意见表达与整合研究》,曹劲松先生的《政府新闻传播中的形象设计与塑造》,徐舫州先生等的《我国跨地域跨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等大作。

关于舆情监控与舆论监督的研究,有范以锦先生等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罗以澄先生等的《“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与规制——以“69 圣战”事件为例》,吴廷俊先生的《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柯惠新先生等的《重大事件舆情监测指标体系与预警分析模型的再探讨》,杜骏飞先生的《绿坝事件:信息如何成为权力政治》,顾理平先生的《论虚拟人群的叛逆性行为》等大作。

关于传播伦理问题的研究,有杨先顺先生等的《网络传播的后现代伦理审思》,杨保军先生的《新闻道德:在职业个体与媒体组织之间》,蒋建国先生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仪式缺失与社会信仰危机》,龙耘先生等的《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

义》,孙宜君先生等的《论新媒体语境下跨文化传播伦理困境与建构原则》等大作。

关于广播影视艺术发展问题的研究,有高鑫先生的《技术美学研究》,王伟国先生的《摄影机书写电视剧本体真实》,张晶先生的《传媒艺术的审美属性》,颜纯钧先生的《蒙太奇美学新论》,李亦中先生的《中国式大片的传播与接受》,杨乘虎先生的《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研究》系列等大作。

关于新闻传播与传媒艺术相关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有李良荣先生等的《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科研新取向》,丁柏铨先生的《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欧阳宏生先生的《论电视艺术的学理重构》,石长顺先生的《电视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方法与模式》,谢鼎新先生的《广播电视学科研究演变的三种范式》,张林、杜彩先生的《光环境设计学科建设构想》等大作。

关于媒介评价评估模式创新问题的研究,有丁俊杰、张树庭先生的《视网融合背景下的电视节目影响力评估体系创新初探》,刘燕南先生的《统一与融合:省级卫视综合评估体系探析》,李德刚、李岭涛先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互联网时代电视评价体系的建构》等大作。

关于媒介生存状态问题的研究,有张志安先生的《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与影响因素》,夏倩芳先生的《“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等大作。

还有一些学者潜心多年,深入探究,推出新作。如赵玉明先生关于江西苏区口语广播,倪延年先生关于民国史研究的视角、难点、原则,周鸿铎先生关于传媒经济发展历程,雷跃捷先生关于广电媒体公信力的受众认知,刘京林先生关于传播心理,杨燕先生关于戏曲传播,舒咏平先生关于广告公信力评估,申启武先生的广播研究等。

还有一些学者或关注前沿,或独辟蹊径,贡献出全新的视角、领域与方法。如朱羽君先生等关于美国大选报道策略,朱虹、尹鸿等先生关于制播分离,喻国明、葛岩先生关于认知神经学用于传播研究,芮必峰先生关于“学习运动”,张君昌先生关于“慢运动传播”,闵惠泉先生关于新媒体的哲学思考,刘利群先生关于媒介与女性,隋岩先生关于传播符号,钟瑛、匡文波、沈浩等先生关于大数据,王四新先生关于“表达自由”,支庭荣先生关于传媒管理等。

此外,来自美国的丹·席勒、斯蒂芬,芬兰的卡拉,加拿大的赵月枝,中国台湾的郑贞铭等著名学者分别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世界传播秩序、中国

传播学研究、资讯社会等领域发表了各自的高论。

收入本套文丛的一册《年度对话》虽然与其他各册在时间节点和体例上略有不同,但在回应时代呼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几个方面,与其他几册的立意完全一致,所以此次也编进文丛之中。“年度对话”是从2004年启动的特别策划,每年开年第一期,由本人代表《现代传播》,邀请在业界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或专家,就过去一年传媒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做一扫描,也对未来一年走势进行预测,给予展望。来自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新影集团、凤凰卫视等传媒管理机构和运行机构的相关领导、专家应邀前来担任对话嘉宾,留下了影响很大的十多个年度对话,成为存留传媒发展进程的重要记录。先后参加年度对话的嘉宾有刘春、汪文斌、王甫、吴涛、梁晓涛、靳智伟、高峰、徐舫州、朱虹、王云鹏、时统宇、仲呈祥、刘文、苗棣、高长力、方兴东等先生。

在本套文丛即将推出之际,我代表编辑部对文章入选本套丛书的各位学者,以及《现代传播》的其他作者多年来对刊物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也是《现代传播》自身历史发展的重要记忆留存。1998年为纪念《现代传播》即将创刊20周年,由1991~1997年间担任学报负责人的朱光烈先生创意并作为总主编,推出了3卷本的第一套“《现代传播》文丛”,分别是:《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尴尬与超越》(李立主编),《走近神圣》(闵惠泉主编)。2008年由本人作为总主编,我们又推出1998~2008的第二套“《现代传播》文丛”。这第二套文丛就基本上按照十年间相对比较稳定的专栏为单位,进行文章的选编,分别是:《新闻学十年(1998~2008):多元与分化》(张毓强主编),《传播学十年(1998~2008):阐释与建构》(张毓强主编),《传播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国涛主编),《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张国涛主编),《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李立主编),《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潘可武主编),《中国传媒经典个案(1998~2008)》(赵均主编),《广播电视名家访谈》(杨乘虎主编)。近五年来,《现代传播》保持了2006年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之后的良好状态,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本文丛的编纂也是对这些鼓励的汇报吧!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历练,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这支编辑队伍茁壮成长,逐渐成熟起来!这就是本套文丛各卷主编,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团队

的主要成员：李立、赵均、张国涛、潘可武、张毓强（特约）、刘俊老师，以及我们的编务张惠云老师，还有长期为我们刊物做版式设计的特约美编卜希霆老师、做英文翻译的麻争旗老师，都默默地为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丛即将推出之时，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的编辑基于《现代传播》这份期刊，而这份期刊的发展离不开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上级领导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宣部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广电总局宣管司、《新华文摘》杂志社等单位的多年厚爱，离不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等的热心帮助，更离不开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与行政的正确领导和着力扶持！在此，我要代表编辑部向长期关心、支持、鼓励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兄弟期刊和学校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领导，特别是李水仙老师为本套文丛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

2015年2月1日凌晨于波士顿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会诊中国电视

——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

胡智锋 刘 春 / 1

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本土化新闻与民生电视的成长/电视传媒本体意识的回归/收视率迷信与贵族化误区/电视改革的体制困局/中国电视的“冬天”还远吗?/公共声音的诞生与电视的“失语”/电视走进“竞合”时代/传媒教育正面对市场的挑战/未雨绸缪,在深化改革中开拓进取

2004:中国电视关键词

胡智锋 汪文斌 / 23

剥离与整合/目标与路径/版权与经营/媒介活动与“选秀”/付费电视/广电政策/网络电视/省级卫视/民营电视/频道改造与栏目改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005:中国电视备忘录

王 甫 吴 涛 胡智锋 / 41

央视改革:无缝链接,稳步推进/频道制:走向“绿色收视率”/省级卫视:定位求突围/份额时代:不是 PK,是竞合/“超女”:本土化的“真人秀”/电视剧市场:火爆有余,火候不足/直播·民生新闻·新媒体/态度·细节·诗意·智慧

2006:中国电视忧思录

梁晓涛 靳智伟 胡智锋 / 57

收视率·收视份额·专业频道品牌化/电视市场化·行业安全/电视新闻·动画·纪录片/点评 2006·展望 2007

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

夏 骏 胡智锋 / 73

中国电视转型未来的痛苦之一,将是中国电视从业人员从机关工作人员到市场职员职业转型

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

高 峰 胡智锋 / 82

中国电视失去尊严了吗? / 电视的尊严从何而来? / 纪录片创作应有战略规划和政策扶持 / “新影”的新探索 / 明天向何处去? / 获得尊严要靠自身努力

2009:中国电视创新对话

刘 春 徐舫州 胡智锋 / 96

2008:“成就巨大,问题成灾” / 体制机制改革的停滞不前导致媒体精神的丧失 / 中国电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 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推动中国电视创新 / 产业充分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媒介的社会责任 / 突破误区,推动电视节目创新 / 中国电视要“走出去”就要先转变

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新起点

——2010《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朱 虹 胡智锋 / 110

新中国60年广播影视发展 / 新闻报道理念的提升 / 电视剧、纪录片积极发展 / 制播分离改革进入新阶段 / 中国广播影视“走出去” / 进一步推动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 / 2010: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意义重大的一个年

新十年新起点:中国广播电视的观察与思考

——2011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王云鹏 时统宇 胡智锋 / 127

新世纪十年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基本特点 / 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新格局 / 中国广播电视传媒的机制改革 / 2010年中国广播电视的年度热点问题 / 新媒体与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融合 / 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 / 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 /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

——2011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加]赵月枝 胡智锋 / 144

众声喧哗与价值危机 / 中心与边缘,霸权与挑战 / 西方与中国,解构与重构 / 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定位 / 思想解放与后发优势

文化复兴的理想与现实

——2012《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仲呈祥 胡智锋 / 161

文化复兴:文化强国的时代宣言/文化生态:文化氛围的破坏·文化宝塔位置的
颠倒/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错位·文化产业价值迷失/影视创作喜忧参半·
历史观美学观偏离/艺术批评:科学标准·观赏性批判

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

——2013《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苗 棣 刘 文 胡智锋 / 177

政策与体制机制层面:亟待从单一、平面的宣传思维,走向多元、立体的传播理
念/内容层面:纪录片、电视剧、电视新闻“三驾马车”并举/市场与产业层面:纪
录片、电视剧、新闻领域的国际市场化程度和难度存在差异/渠道层面:发挥节
展活动与网络传播的作用/人才培养层面:以合作带人才,重视项目管理人才的
培养

需求与引领:传媒生态与监管服务之变

——2014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高长力 胡智锋 / 191

统筹、放权、服务、改革:政府对传媒管理与服务的新思维/媒介融合时代的传媒
格局:“电视将死”未必是真命题/从五种节目类型看 2013 年电视内容生产状
况/国际传播、公共文化服务与传媒教育的几个关键问题

媒介融合与网络强国:互联网改变中国

——2015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

方兴东 胡智锋 / 209

2014 媒介融合元年:新的历史使命/媒体融合的现实困境、基本目标与路径/互
联网改变中国/世界互联网中的中国与世界

后 记

/ 232

会诊中国电视

——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

◆ 胡智锋 刘 春

对话时间:2004年1月13日

对话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对话人:胡智锋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传播》副主编

刘 春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电视策划人、制作人、评论人

文字整理:张国涛 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电视改革;本土(地)化;收视率;传媒本体;产业化;体制改革;公共声音;
竞合时代;传媒教育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2002年,你的“盛世危言”和“航空母舰”^①两篇文章在我刊连续发表之后,在业界和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有不少文章从中引用了你的言论,可喜可贺。《现代传播》对媒介批评类的稿件发表不是太多,但是你的那种与人为善的建设性批评是我们刊物所提倡的。近两三年来,《现代传播》在业界和学界的地位与影响稳步提高,这为我们继续开展这种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媒介批评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平台和空间。我想这是我们展开这次对话的前提和初衷。

你在“盛世危言”和“航空母舰”当中所谈到的问题,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了,但要得到真正的解决看来还需要更多时日。两年来,整个中国电视格局,从中央到地方,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步和发展,成绩不可磨灭,但问题更不能忽视。尽管有些问题更多是以往问题在今天的延续,但它正是传媒业界和学界最关注的焦点内容。我想我们今天对话的内容,就是对中国电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盘点,对当前中国电视的格局进行尽可能深入的会诊,我想我

们对话的标题就叫“会诊中国电视”，目的就是给中国电视把把脉。我们来做“电视医生”，把中国电视当作一个患者，它既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亚健康的部分，也有病患的部分，通过把脉和会诊，可以发现哪些地方是健康的，哪些地方是亚健康的，哪些是病患的部分，给出一个客观的、辩证的“问题单”，然后就业界和学界普遍感兴趣的和关注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刘春(以下简称“刘”)：这个出发点选得很好，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也不是“形而上”地谈些“主义”，我们是先来发现问题，然后研究问题。

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

▲ 中国电视近 20 年有一个“逢三变革”的历史巧合。

▲ 中国电视遇到了很多的宏观性问题，遇到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

胡：从你的个人感觉来说，目前围绕中国电视的生存状态，中国电视最危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刘：讨论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愿意先说好话。为什么呢？因为进步来之不易，我一向是这个观点。大家都知道，中国电视近 20 年有一个“逢三变革”的历史巧合，1983，1993，2003，这三个年头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革。1983 年是“四级办电视”，“四级办电视”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带来了 many 负面影响，比如重复建设、机构臃肿等。但是，它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而且放在整个国有企业、整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角度来讲，如果当年彩电不是重复建设，哪能带来今天激烈的竞争，哪能杀出像长虹、海尔这样的大型家电企业。像现在香港控制得很好，只有两家电视台，还有一个有线台，没有什么竞争，所以香港电视没什么大的发展。我认为，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电视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四级办电视”带来了中国电视机构的繁杂，繁杂以后市场格局就比较复杂，生存环境就比较恶劣，就为展开激烈的竞争提供了前提。这是所谓的“八三变革”。

胡：是的，（19）83 年的事情已经争论很多，现在依然未停。“逢三变革”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年代上的历史巧合，这里边可能也暗含了一些内在的规律，实际是中国电视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一个自然爆发。“八三变革”的背景是中国电视前 20 多年的发展，而变革带来的后果当然也是始料未及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电视的

“逢三变革”当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即无论它的变革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在结果上都出现了一种“歪打正着”的现象。就“八三变革”而言,其初衷并非像后来的结果那样。1983年全国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电视”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将党中央的声音传达到千家万户。结果没想到,地方借助改革开放的动力,利用“四级办电视”的由头,将新兴的电视媒体变成了地方领导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是始料未及的。此外,地方还把本来意义上的电视差转站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电视媒体——电视台。对这样的结果,批评最多的当然是利益受到冲击最大的中央电视台,它认为涌现出这么多地方电视台剥夺了它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刘:我插一句话,从表面上看,“四级办电视”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计它的产业布局的,显然是不符合电视的技术属性和传播规律的,但是中国有很多事情总是靠行政的力量和手段来推动的。

胡:对,当时电视市场就是靠行政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今天的电视领域内,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和市场前进的惯性仍然没有结束,行政手段依然是非常有力的一种方式。从正面来说,行政手段能把中国电视从整体上做大,如果不是“四级办电视”,只是由国家台(中央台)、省级台两级电视台,那就很难形成现在庞大的局面;但是反过来看,“四级办电视”带来的问题,是有限的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有限的市场得不到充分的开发,给今天电视产业的继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刘:1993年的改革,我以为,确立了中国电视的两个标尺。第一个标尺是在内部机制上确立了制片人制,我特别看好这个制片人制。尽管现在制片人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财务控制问题,比如用工问题,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当年《东方时空》推出的这个制片人制,那么中央电视台远远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格局。我常讲中央电视台节目改革最重要的动力都是来自于这个相对健全的制片人制。这个制片人制在栏目策划、栏目用人、栏目改版、内部评审、栏目扩张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一套灵活的办法;这个制片人制导致了中央电视台内部细胞的空前活跃,它不断分裂,不断扩张;现在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好栏目基本上都奠基于此个相对完善的制片人制。当然,它也有很多毛病,但我相信以后是可以克服的。“九三变革”确立的另外一个标尺,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过去也有,如《观察与思考》,但是到了《东方时空》,可以说是第一次以栏目化的方式,明确地、有规模地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

行监督,以致等同于某种政治权威。“九三变革”确立的两个标尺到了21世纪都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中国电视遇到了很多的宏观性问题,遇到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单纯地依靠节目、栏目的改版,单纯地依靠某种权威开展的那种舆论监督,电视改革的步伐已经走不下去了。我还发现,所有人都把电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上层,希望话语环境能够进一步宽松。实际上,电视改革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因为宽松并不意味着电视就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胡:关于“九三变革”的争论也不少。我认为,“九三变革”最初更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冲动”,同时也是央视改革的一种需要。包括像孙玉胜、梁建增、袁正明、时间、陈虻等这些比较前沿的电视人,当时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电视人的“冲动”,这个在孙玉胜的《十年》当中有些论述。从中央电视台自身来说,它要建设一个国家级大台,当时就需要打开一个“缺口”,当时电视改革已经涉及新闻改革,但在实际上,新闻本体性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突破。“九三变革”在节目栏目化、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等方面建立起来了新的框架系统,把制片人的形象、主持人的形象给托起来了,中国电视在传播手法和语态上都有了不少变化,电视的人际传播开始出现,同时内部制度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激活了原有电视机制的潜在活力,“九三变革”的意义更多是在这里。这一点我同意你以上的说法。同时,我还认为,“九三变革”的最后结果,实际上是上下合一、共同促成的,和“四级办电视”的情况有些相似。

刘:2003年,中国电视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制度上实现突破,但有些“变革”的迹象已经表现出来。第一,“新闻”的出现。电视过去有新闻,但是,我一直认为电视没有把新闻上升到非常重要、非常本质化的高度。我们看一张报纸看什么,不是只看它的文采、看它的副刊,而是要看这张报纸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信息。同样对于一个电视频道,尤其是新闻频道,我们更是要看它所能够提供的信息。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直播,随着SARS的报道,随着新闻频道的开办,所有电视媒体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新闻”对其的重要性。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曾经说过,东方卫视可以办娱乐,但是在新闻上没有突破,东方卫视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主流媒体。为此,2003年各个台都在找自己的路子。中央电视台在直播报道、拓宽话语权、开播新闻频道等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在新闻方面形成了做大做强的架势,而地方电视台则更多在尝试本土化新闻、社会新闻的路子,适合于口语化传播、个性化传播。这是2003年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第二,很奇怪的是,2003年电视改革的动力更多是来自于上层,大部分动作